

# 再生

日二十二月二年七卅 刊 週 期三〇二第

號七〇七第照執理管政郵東川

類紙聞新類一第爲認記登政郵華中

號四九五二第字警證記登誌雜部政內

社  
日皇出巡  
言  
取締在案

民主政治的真諦

論憲法與民主政治

雜談政局動盪中之三個問題

我們能防止日本再起嗎

文化工作者的歷史任務

中國歷史上之地方政區

· 黎 玄 ·

· 王 揚 ·

· 方建民 ·

· 梁夢覺 ·

· 李兆璉 ·

· 杜 衡 ·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行發社版出生再

號一十三弄九四七路園愚海上

(元千八價售期本)

(版出日期星逢)

本月日皇將為戰後第二次之全國周巡，官內省已敬謹預備，其任務將使兆民於復興準備，卓具宏猷之時，瞻仰天儀，景然有山河無恙之思，繼往開來，以圖再造，麥克阿瑟實賦頌之。我們這邊聞風研殺正熱鬧，滄海東頭，不管美國是否那翼，抑或日本人民自己爭氣，總之瘡痍漸復，方興未艾是真的，試看麥帥允許保留的日本工業是什麼？拆卸賠償我們的是什麼？三菱三井等四大財閥之久已決定解散而忽予完整保留為什麼？日本警察武裝警戒範圍擴及陸海又為什麼？我們在海邊邊跳脚嘔吐了嗓子，同時又有勸慰我們不必大驚小怪的，這些適足以使日本人更警惕，更加緊，更感恩而已。最近一樁事，我們或沒有嗅到其慘烈性：傳說了兩年的駐日佔領軍，因內在外在的梗阻，到今日未遣一兵一卒，腹彼東土。有之為本月二十日赴日的四十名憲兵，其任務並非當日所談的佔領，而是限於警衛東京我國駐日代表團，代表團成立已兩年，且有若干被俘釋放的抗戰兵士担任警衛，今日何以需要這四十名憲兵去加強警衛，殊為不解；若說是「象徵佔領」，且慢，麥帥最近已闕照過我們政府，說明這一隊人是去警衛團的，切勿大事宣傳，免滋「誤會」云云。此話從何說起？理應予以痛駁，麥帥這幾句話，關係我國國際地位，聲譽，和佔領意義，但我們尚未聞外交部有一句回嘴。總之大樹底下好遮陰，日本現正不擇手段地在「復」字上做工夫，復員，復興，甚至「復仇」，都在衝疾走地向前猛晉，今日日本人已深深體味到「剝極必復」的解釋。日皇，這具有比原子彈更大威力在拜皇心理的日本人民中，其出巡的意義，非同小可，無此不足以籠罩「復」的工作，麥帥的裝置日皇，亦無異於英國的報復非洲酋長，當日日本投降，日本人斤斤以保留天皇為鑰鑰，其實到今日日本人民想廢皇也辦不到，何也，麥帥的香火，廟產，還要照這裝金的神龕的牌位，而在日本軍財兩閣中潛伏的野心家，也何嘗不明白自己這個半神權的國家，非此物不足以資號召。勝利之日，中外熱烈人士曾以為將主席抗日功高，以戰勝國主帥之尊，應有巡視日本之舉，不知此事目下美國可認為不滋「誤會」否？

### 取 締 在 案

現在若講理想的民主，則是人民都有完備的教育和尊重法治的精神；此憲政之神髓也，吾無以易之。二十年訓政的收穫，則應為養成人民守法的習慣，與夫官府之令不虛發。本年春節雖在遍地烽火中屆臨，上海一隅，素來粉飾承平，似又在陶醉和未能免俗中度過。一兩件當令的小事，足以使我們懷疑官府今日之效率何在與夫官樣文章豈真香烟不絕？和大小市民有關的理髮浴室業在年終歲首這十天裏，依例高抬其價，以草率的工作，需求雙倍以上的報酬，乘人之急，久成惡習。今年社會局頒令取締，實稱詞理瑣細，不幸禁令等於弁髦，加價並未稍改，理髮業詢以社會局不會有話乎，理髮師莫不掩口葫蘆，至於顧客俯首照付而後止。社會局若知其不可行，何必多此一舉？豈以為除舞業外其他百業悉為順民，一紙公文，便可革除陋習？則咫尺之遙，雖非悍然不從，亦是幽默之至也。諺曰「瘋官告示多」，官府中人閱世熟，明知告示無效，不過在工作報告之中備此取締之案，官府「照得」的責任已盡。會聞取締爆竹有令，某報目信以為真稱之為「無聲的新年」；會聞取締游丐有令，外人著論有淨化都市之譽；但自送灶以至接財神，夜靜更深，撈拍不絕；歲朝出行，乞討相望。無他，祇要取締在案，不必定求效果，不觀夫每次物價蠢動，官府必有抑壓之令，此之謂盡其在官。若每件事都求言行一致，則我們又向那裏去摩挲官樣文章呢？



## 民主政治的真諦

· 黎 玄 ·

「民主」在今日，雖然已經成爲時髦名詞，而且是世界和平與戰爭最大的分界線。民主是什麼？這個問題顯然不易答覆，因爲在今天的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國，我們對於它的認識，理解，都是極其混亂與困難的，因爲由於其社會階層的不同，各憑主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前進的人士在喊着民主，反動的份子也喊着民主，民主這一名詞，已把許多人的頭腦混淆了。

不過，民主畢竟是有一定的客觀的內涵的，譬如說，法西斯的形態是由少數人或一個人握着全部的政權，這種政治是叫做專制或獨裁，絕對沒有民主的氣息；倘若我們再從歷史上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裏，大多數的人民都是他們少數封建領主的農奴，他們不能享有一切的自由，如人身自由，言論思想，集會結社，宗教信仰，遷居營業，通訊祕密的自由等等，換句話說，他們是少數封建領主的財產，生殺予奪之權都操在這一些人的手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民主一詞，自然更是牛頭不對馬嘴了。

現在，橫在我們面前的民主問題，自然不是十九世紀民主的內涵，也更非法西斯魔王那樣乾脆獨裁所能比擬。我們可以說，陳舊的民主是名爲全民實則爲資產階級所獨佔的民主，而我們心目中所認爲最真正的民主應該是包括着大衆的政治與經濟的民主，僅有政治民主而沒有經濟民主，即人人在法律上的地位雖然平等，而工人與農民却祇有失業與饑餓的自由，這種民主顯然是虛偽與不澈底的。不過，我們今日的頭腦中所充滿着的民主的概念，大部份是從英美灌輸而來的，等到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上抨擊英美，並提出蘇聯本身才是實行真正的民主的時候，我們對於這一問題顯然又進入了另一新認識的境界，那麼，到底是蘇聯的民主好呢？還是英美的民主好呢？萊士會說過：「我們不願在奴隸的世界與落伍的享樂標準之

間有所選擇，失敗論者志在恢復往昔美洲主義的盛世，他們的意思是回復少數人富有，多數人貧乏的時代。我們要在一切人類的民主政治與少數人的民主之間加以取捨，究竟要普遍地給予一切人類以社會保險和經濟機會，抑或容忍我們的富饒資源集中於自私者和貪婪者的手裏？」華氏這一論調，可以使我們藉以區別假民主與真民主的精神是在那裏？然後再加以揚棄，以便發現民主政治的真諦。

經濟的民主與政治民主是不能分開的，政治民主是經濟民主的前提，而經濟民主又爲政治民主的內容。在蘇聯，她的國內已經沒有領主與資本家，沒有壟斷與獨佔，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這是經濟上澈底實行民主的國度。然而她的政治民主，雖然但在憲法上規定選舉不受財產的限制，和沒有男女的界限，但蘇聯是由一黨專政，而且用獨裁的方式和革命的手段去達到經濟平等的目的，所以這種形式，仍然是以經濟重於政治，換言之，蘇聯已經有了新民主的規模，只要她能夠從一黨的階級專政解放出來，讓人民有了政治的自由之後，真正的社會主義就不難實現了。

除了蘇聯所標榜的民主之外，支配影響我們最深的還是英美型的民主政治，這種政治的實質和內容是什麼？它代表誰的利益？建築在什麼樣的基礎上面？它的背後操縱者爲誰？這一切都是生活在近代民主政治中的人們所必須急切明白瞭解的問題。因爲我們明白了這些問題之後，便可以澈底的認識民主政治的真面目，進而給予正確而適當的評價和達到裁長補短的运用。

近代的民主政治雖然在英國發達最早，歷史亦最長，但它所表現的資本主義色彩却非常的濃厚。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大牛產生於英國，同時資產階級在初期的英國民主政治中，不僅是幕後的操縱者，而且也是幕前的表演者，雖然經過三次的選舉改革案，但在事實上，這種思想和制度的遺傳

，仍然還是無法避免的。蒲厄爾在其所著的「歐洲政府」一書中更明白的指出十九世紀，即民主政府的極盛時代，乃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時代。他說：「歐洲自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以後，即已重視個人的尊嚴與價值。這種觀念，到現在還沒有破除。法國大革命否認皇帝專制及建築在門第特權之上的社會上顯著的平等，同時斷言個人在國家範圍內有政治上自由平等的權利。革命的動力發生於中產階級，他們盼望行使與其經濟上的功業相等的政治權力。這個階級認為國家的職權必須受成文憲法的嚴格限制，並不許干涉個人自由，政治不能由少數聽命於國王或王后而不負責任的大臣包辦，它必須由代表民意的民選議會公開處理。為保證政治上的支配權，中產階級要求選舉權的擴張；結社、出版、訴訟自由及教育上的便利；為保證經濟上的支配權，中產階級要求國家採取放任政策，禁止干涉工商業，並給與個人以獲得財產的充分權利。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理論與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經濟狀況，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從歷史的觀念看來，民主政治的誕生與資本主義的誕生，適相符合，十九世紀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時代。」至於共產主義者如列甫，對於民主政治的抨擊，更不遺餘力。他認定近代民主政治，完全為資產階級所專有，一般人民並沒有享受到真正民主政治的到益。他說：「在一般德謨克拉西的國家中，大市民業雖然能在法律上享有絕對平等的權利，但事實上他們却為種種陰謀與政治狡計所播弄，對於他們應享的德謨克拉西的權利反不能得到真正的享受。」從上面兩種引錄中，我們便可以看出民主政治產生的背景以及它與資本主義的密切的關係。但是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呢，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所專有的政治呢？下面三個客觀的事實可以作為論斷的根據：

第一、近代的民主政治所根據的原理就是個人自由主義的思想，從盧梭的「民約論」亞當士密斯的「原富」，到邊沁的「功利主義」，可以說是一個人自由主義的代表作，近代的民主政治所根據的原理大都包括在這三大經典之中。這三大經典所討論的題目和內容雖各有不同，可是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出發和歸結，則毫無二致。因此，由於個人主義盛行的結果，尤其是主張個人福利重於國家福利的亞當士密斯的個人經濟學說盛行的結果，必然的會走上資本主義的途徑。試問在個人自由主義的原則之下，

國家對於個人所採取不干涉的態度，而讓個人唯利是圖，這當然只有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達。所以上述三氏的著作不僅是民主政治的經典，同時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經典，這樣，它便正確不易地說明了近代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的密切關係，彼此無論如何是不能分開的。

第二、從近代民主政治實行的經過來看，遠在一六八九年，英國已通過了有名的權利法案，到了一八三二年，更通過了一個關係更大的改革案，於是英國民主政治的基礎才從而奠定。但是從權利法案到改革案的成立，可以說是資產階級的私有物，尤以後者更是資產階級的得意傑作，在這個改革案中，具體的規定以資產限制選舉權，這種限制，直到一九一八年人民代表選舉法通過以前，都是或多或少地被保留着。所以我們從上述的實行經過來看，可知在英國初期的民主政治，資本主義的色彩是特別濃厚的。其次談到美國實行民主政治的經過，她不但深深地受到英國的影響，而且美國根本也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的國家，美國的資產階級對於產權的轉移，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蒲來士在其所著的「現代民主政體」一書中說明美國政治組織所根據的原理說：「革命時代的美國人，是從一種原則或學理出發的——這種人民主權，一切權力均出源於人民，權力的掌管是要依照人民的意志，同時還得承受人民的嚴格監督；權力的執行是為人民的利益，其他一切原則是平等。這種原則祇適用於公民權利方面，各人的公民權利是沒有區別的。但政治的平等却不完善，有幾邦的選舉權祇限於資產階級，窮人與社會沒有相牽連的利害關係，所以是沒有政治權利的，但到了後來，各邦就把他們的公民都一律平等待遇。」美國初期的民主政治是如此，以後的情形又如何呢？蒲氏又說：「人民對於財產勢力的憤怒與猜疑，特別是那種極大的公司，他們以種種的方法運動了立法議員官吏與政黨，往往有壓迫人民的行為」，總之，就美國實行民主政治的經過，也是與資本主義分不開的。

第三、從近代民主政治中的選舉與金錢的關係來看，近代民主政治之所以被稱為民主，就是因為它實行選舉制度，選舉制度可以說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靈魂。不過，選舉之不能離開金錢，在初期以資產之有無為選舉標準的民主政治固不必說，就是以後取消了資產的特權並實行普選的時候，實際上能够當選的還是必須依靠大量的金錢，譬如說，一九〇〇和一九一四

四年美國的大選，共和黨與民主黨都用了好幾百萬美元從事宣傳，拉攏的種種工作；再以最近我國的普選來說，不管公的或私的都支出了大量的金錢，一個立委，國大和省參議員除了公開花耗需要好幾十億外，還得暗中從事賄賂，照此看來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好，非資本主義國家也好，假使一個人缺乏金錢，就是有了很好的學識與品德，也休想問津，所以，近代的民主政治不能說離資產階級的控制，至此又可以得到了一個有力的明證。

當我們明白了蘇聯的民主政治只是先側重於經濟，而後進而完成政治民主的實際之後，我們對於共產主義者或社會主義左派所加予我們的機械的條條，不能不有所捨與選擇，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都不能原原本本地移植於另一個國土上面，馬克斯學說潛指出社會的進化是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按步的達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他把過去的歷史分成上面的幾個階段固然無可厚非，但他說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建立在資本主義頂點上面，則未免太過機械了，反之，資本主義的國家認為他們的民主制度可以無限制的輸出，並且拒絕任何社會主義者的啓示，也是跡近昏暗，我們只要看資本主義的修正派，主張以急進課稅方法，節制資本，並倡率進步的社會政策；如勞動保險，容認集體罷工，集體契約等就可以知道資本主義的國家也未始不能以革命並非暴力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的理想，現在的美國，已經建築起若干華麗的大廈，但裏面也孕育着不少共產主義的溫床，如何使這種變扭的現狀變成廣藏天下寒士的大廈，是有賴於繼承羅斯福的新政者怎樣去保留民主精神的傳統，而非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民主的醜態，關於這一點，美國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如華萊士等都已在此積極的行動了。

中國當前的慘痛，是由於兩極政治招致而來的。不過，這個國家既沒有實行極權政治的條件，也缺乏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自由競爭的靈魂，這樣，如果說她不能跳過兩種制度的階段，而進入新的社會主義的境界，那是絕對不合理的。以現階段中國的民主來說，如果在政治上能够實現法治，保障人權，法律平等，普通選舉，出版言論自由等；在社會上，經濟上，如種族平等，性別平等，信仰自由，教育普及，以及節制資本，保障勞工等，那麼，在大眾公認應當爭取的目標之下，祇要共同的主張，各站各的

崗位，中國的社會主義便不難完成。

中國將來的民主政治，倘要做到名符其實，我們就非消滅兩極政治不可，要消滅兩極政治又非激進的實行社會主義政策不可，因為我們資本與官僚政治必須從盤據於廣大農村中，具有歷史的支配力量的地主，高利貸，商業的剝削者的封建勢力上剝掉，而國家所必需的若干富有伸縮性的建設計劃，容許私人企業，以及不以階級為標準的民主計劃經濟也非軍閥暴力與史列學說所能為力，所以民主主義政治，真正的建立在公平而合理的普選之上，它可以與社會主義的經濟並行不悖，以不流血的革命運動號召中國新進的勢力。我們今天要求政治的民主，同時也要經濟的民主，我們祇要減輕人民負擔，改善農工的生活，取消一切假公濟私的統制政策，肅清一切貪污腐化的官僚份子，糾正過去殺雞求卵的財政政策與租稅政策，則經濟民主化就可以逐步實現，經濟民主一旦完成，中國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愈接近了。

## 讀史劄記

### ◆ 升陞之疑

· 訥菴 ·

考華陽國志載：「蜀有王曰杜宇，七國時稱帝，號曰望帝，其相開明決玉壘以除水患，帝遂委以政事，禪位於開明，升西山隱焉」。又說文云，「望帝淫其相妻，慚、亡玄、化為子鵲鳥，蜀人聞鳥鳴，曰：是望帝也」。又華陽志亦曰：「時適二月，子鵲鳥鳴，故蜀人悲之」。望帝化鳥之神話，姑不置論，惟帝既淫相妻，開明又功高，則禪位升陞，未必非被僞而然，或竟遭幽廢，其死亦有可疑，故蜀人悲之，化鳥之說，適其時耳。杜少陵詠杜鵑七古詩，即指唐明皇，詞意明顯，亦以肅宗即位靈武，明皇在蜀，固已無辭可復，結果尊為上皇，迎還西內，等於升陞也。曩見蜀人李君所著厚學，略謂舜陞方，崩於蒼梧之野，以禹已著平成之績，且修殺父之怨，（舜典，殯鯀于羽山）故舜走死南荒，不得北歸也。（原貴大意如是）語雖捏造，未經人道，然不能說其無理。况自禹之立，即不傳賢而傳子，已開後世家天下之局矣，（後漢書傳註：「舜妃溺於湘水，為湘夫人。」即湘靈也，又博物志云，「舜崩二妃以啼揮竹，竹盡斑。」世傳妃將沉湘水，望蒼梧而泣，灑淚成斑，即以此，是二妃悲舜野死，遂以身殉，亦其一證）及魏文帝受漢禪，山陽公（即漢獻帝）且奉二女以饋于魏，（竟完全抄襲成文）其臣亦曰：「陛下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云云，如此禪讓，讀之失笑。

# 論憲法與民主政治

· 王 揚 ·

## (一) 批判底理解

如果說任何一件事情的演變，都一定是有其階段性的，則我們的民主憲政運動，由「制憲」到「行憲」，在全部國民革命的過程上，可以說：乃是一新的階段了。而由「行憲」起再往下去，則又可以說：乃是一嶄新的階段。這就是說：憲法在客歲的「耶穌聖誕節日」雖然是生效了，而它的功用的全部發揮，不是一蹴可幾的——它的全部內容，事實上也必須分別的逐漸的而生效。而這個嶄新的階段，目前，是它重要的開始！

當此時際，吾人對於憲法——國家的根本大法，我覺得：不僅需要一讀，實應加以再讀，尤應該加以批判底理解才對。因為：「民主政治下的任何人，在總的方面，是一個自治者而不是一個被治者。」（見拙著「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這裏，筆者是先就憲法的一般定義及其對民主政治的重大功用等方面提出淺見；關於我國憲法的內容與特徵之處，擬另行作題探討。

## (二) 憲法的定義

憲法，英文是 Constitution，它的定義，在商務版的「辭源」上，是作這樣的解釋：「憲法，凡立憲政體必有憲法，所以規定統治權之所在及其行動之形式；有最高之效力，非其他法律所能變更。」根據這個解釋，從簡說：憲法，就是一個國家立國的最高「法則」。英文的 Constitution 本源於拉丁文，含有「組織」、「政體」、「制度」等三個意思。希臘唯心哲學底鼻祖（同時也是地質學、倫理學底創造者）亞里士多德給憲法的定義便是：「憲法是表示國家各種職務的組織，并規定什麼是統治團體和什麼是社會的目的。」

我國孫中山先生給憲法的解釋是：「憲法就是一國的政權分作幾部分

，每部份是各自獨立，各有專司的。」

亞氏和我們的中山先生的解釋：說明憲法的內容確是一種「組織」、「一種「政體」、一種「制度」。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人，對憲法所具的觀念，當不倖係如此。譬如我國已經生效的憲法，就不僅是一種「組織」、「一種政體」……可以說：它還是人民「參政」與「自由權利」的保證書。然而，憲法的內容，實質上，確是不外乎是一種「組織」、「一種「政體」、一種「制度」。正如中山先生曾經用比喻解釋憲法說：「政治上的憲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機器。」

## (三) 憲法的實質與起源

在學說界上，憲法是可以有兩種類別的，所謂「形式憲法」與「實質憲法」是。「形式憲法」指實施憲政的國家確實存在的那部憲法；「實質憲法」是指理論上的一種辯證，即任何國家社會中，或者說任何人類社會間，事實上的存在，是有生活規律的，是有社會秩序的，（儘管那種生活規律和那種社會秩序的形式在文化水準和知識水準上說都很幼稚。）皆可以承認它是有憲法的社會。但若從實際方面說，未嘗立憲，未嘗實施憲政的國家，這一種解說是完全被否定的。

我國在歷史上的政治教化，所謂「實質憲法」，表現於儒者筆下的有：「永垂憲則，胎範後昆。」（見唐書）「文武是憲。」（見詩經）「憲禁於王宮。」（見禮記）「稽古憲章，大釐制度。」（見晉書）三代時候，會有人民議政的制度，和實行「井田制」。但，只是文字上或思想上的近於現代憲法，和制度上的一部份偶似現代憲政，故我們歸宗明文的說：我國在歷史上，「理論辯證」的「實質憲法」是有過一點的，但概念異常模糊。

從而我們說：憲法的起源究竟是什麼情形呢？

凡稍讀過歐洲政治史者必定會知道：憲政是從英國始的；英國乃是憲政的搖籃。一二一五年，時英國為約翰當國，「大憲章」發佈，王者的特權，開始被削減。不過我們必須弄清楚：「大憲章」並不是憲法，雖然，英國憲政的開始，確是可以從它算起的。「大憲章」刊有六十二條，其內容的要點，為徵收新稅或特別稅必經大議院的認可。事因約翰王時徵兵役，復時行暴政，諸侯感到了疲於奔命，遂聯合僧侶，陳兵規諫，及上改革案逼約翰王承認，約翰受勢之逼迫不過，只好予以承認。而此項所謂「改革案」，即後世以至於到今世所譽之「大憲章」是也。

從「形式憲法」說，「大憲章」乃是所謂「不成文憲法」，一直到現在，終於英國人民的保守性，英國的憲法始終是沒有具體條文。在整個憲政的演進上，世界各國最先有完備的成文憲法的，是美國。中山先生說過：「……孟德斯鳩發明了三種分立的學說之後，（筆者註：孟德斯鳩「法意」一書的發表，是在一七四八年。）不久美國發生革命，訂立憲法，是根據於孟氏三種分立的學說，用很嚴密的文字，成立一種成文憲法。後來日本維新，和歐洲各國革命，差不多都是拿美國的憲法做底本，訂立憲法。所以，中山先生曾又肯定的說：「世界各國成立憲法最先的，就是美國」。故我們對於本節問題若要有個結論，這樣來說該是比較適當的；在實質上，英國在十三世紀初葉便是一個「憲政」的國家，但它始終却沒有一部成文的「憲法」。以論「憲法」的起源，世界上最早的真正的成文憲法的產生，是屬於美國的。

#### (四) 為什麼需要憲法

為什麼需要憲法？這個問題的提出，也許嫌有些突兀，但其實是很正常的。我們在以上「憲法的定義」一節中雖然無形中也已等於說過這個問題，然而，總似乎覺得有進一步對它作正面的研討的必要。

多少年來，凡是對國家具有熱望的人，差不多可以說：是具有同一個意旨的，這意旨便是熱望國家能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而所謂現代的國家，張君勱先生說：「……就是一個民主國家，對內工商業發達，注意科學研究，乃至於軍備充實。對外維持其主權之獨立，領土之完整，且能與各

大國相周旋。至於政府機構方面，一定有內閣，議會以及選舉制度。這都是現代國家的特色，亦即近代國家應具備的種種特點。此種現代國家之特點，萌芽於英倫，至法國革命後而大成於歐洲。雅片戰爭後，歐洲國家踏進我們國土，我們最初認識的是船堅砲利，最後乃知道現代國家的基礎在立憲政治。……」

「最後乃知道現代國家的基礎在立憲政治」，所以我們要想我們的國家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就得是一個立憲的政治制度的國家。而爲什麼需要憲法呢？問題到這裏實已有了解答。既是一個「憲政」的國家，當然就需要有一部憲法。若是說：英國不是一個「無成文憲法」的憲政國家嗎？關於這，我們的解答是：英國的憲政的確是有點特異的，它在法理上，不但不是民主的國家，并且道地的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但明白英國憲政實質的人都會承認：英國道道地地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可是，對於英國，有些是不能學的，中山先生也早經說過這樣的話，他說：「有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但，英是不能學的……」。

爲什麼？爲什麼嗎？並不是因爲我們客觀的條件和英國不同，主要的，是因爲憲法對民主政治有它重大的功用。

#### (五) 憲法對民主政治的重要功用

「憲法對民主政治有它重大的功用」，這功用是什麼呢？請先再讀中山先生的一節話：「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爲民主；而第二決定，則以爲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而後可以圖治。」（見「中國之革命」）

憲法對民主政治的重大功用是什麼呢？基於中山先生的啓示，我們說：民主政治，假使無憲法爲其根本法，則朝三暮四，將一無約束，且一定要生出流弊來，那就是：民主，在形式上不變；在實質上變成了「民主專制」。譬如總統的任期在憲法上的規定爲六年，和連選得連任一次。假使沒有這個規定：沒有這個根本法依爲準繩，今年的新任總統；明年人民可能反對他和逼他下台。而連選得連任的話也根本提不到了。所謂「依法罷免」，當然亦不用提了。

所以，一個民主國家，必定須有一部民主憲法——即所謂「根本法」

。這個「根本法」，對於國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的劃分；人民自由權利與參政權的規定劃分與規定得愈清楚愈充實，便愈進步；它應具有的民主政治的固有色彩也才鮮明光輝！而使得民主政治的固有色彩能以鮮明光輝，意義不僅在於有一部憲法而已的；人民和人民的公僕，（這公僕包括地方上的保甲長，也包括一國元首的大總統。）「有所守」是更主要的意義。因為：「憲法所規定的是國家權力的如何確立與如何限制」。（張君勱先生說。）王寵惠先生也嘗說：「民主政治，既有所爭，必有所守。所守者何？憲法是也。」

總之，憲法對民主政治的重大功用，在消極方面，是「約束」；在積極方面就是剛剛所說的：人民與人民的公僕唯以有所遵守。故憲法除可謂之為「支配人事的大機器」；亦可謂它像民主政治的「契約」。

### （六）認識憲法，提高權力的警覺法！

誠然，憲法是民主政治的契約；是「政治上支配人事的大機器」。但憲法的存在與其功用的發揮，同於文學上的劇本，不實際的演出於台上，是不值一文的。

西人拉撒爾有云：「成文憲法的作成，不是重要的，如有必要，三日即成。」

這就是說：憲法本身乃是一篇文字；是一張紙頭，而它底價值的產生，不屬於它的本身；乃是屬於國家人民和人民的公僕對它的看法和態度底決定方面的。

## 雜談政局動盪中之三個問題

當今政局正在紊亂中，人們心理難免呈現恐懼和憂慮。這恐懼是愛國的恐懼，這憂慮又是愛國的憂慮。國家並非在外侵來時才有這種覺悟，而內亂中亦不能不注意。多少國家為外侵時而滅亡，亦有國家因內亂不得結果引起外族的侵略。中國於這數十年來受外侮內憂造成許多悲慘狀態，不

「成文憲法的作成，是不重要的。」不僅此也，我們還覺得：憲法的由上而下底片面的施行也是不什麼重要的。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全體人民能自覺的擁護憲法，和知道實行憲法，及明瞭憲法是人人身體自由等權利的保證書。

中山先生說：「憲法之所以能有力，全恃民衆之擁護，假使祇有白紙黑字之憲法，決不能保證民權。」張君勱先生說：「憲法本身所以能保存，並不是一張紙片的文字就夠的，而是要靠國民時刻不斷的注意，然後憲法的習慣方能養成，然後憲法的基礎方能確立。」

那末，怎樣擁護憲法呢？怎樣「不斷的注意」呢？舉例一：假定有人無故被政府逮捕了，人民一定要用方法（根據法律）使他將人放出來，這樣，使政府此後不敢再非法逮捕人民。舉例二：人民是有言論自由的權利的，假定政府隨便封閉代表輿論的報紙，便是剝奪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遇有此事，人民要訴之法律，使政府不敢隨便封閉報紙；而人民言論自由權利以獲得保障。

這個做法奇怪嗎？我得向你大聲疾呼：一點不奇怪，這是一個標準好國民應有的行為；那樣做，你不但維護了自己的權利，你是維護了「公共道德」；你是擁護了國家的憲法。同時告訴你：憲法上，本來給你有一種權力！

如果你對於憲法還摸不清楚，那首先你應該認識憲法；之後，為了愛護憲法，使我們的憲法不遭到「是一篇文字是一張報頭」之譏，記住：你隨時要提高你底權力的警覺性！

能說沒有經驗。當前又碰到這樣厄運的內亂，愛國心重的人們，誰不為此擔憂呢？

余有二位同鄉，一從南來，一從杭返，久遠未曾見面而能在一起聚會，難免要痛談一下。那時我們話匣打開由個人私生活轉移到政局問題上來

·方建民·



大家對政局問題都感到憂悶，這種憂悶亦可看出他們對政局是如何的關心。其中有兩政局的三個問題，他們來詢問我的感想，當時我因要事急欲離開，未能給他們詳細地答覆。如今想此三問題確有公開討論的價值，故再重新講述於后：

第一內亂問題：我對此問題久不想談，尤其在這樣難以說話的環境裏，我應沉默為是。問題既然提出祇略談它幾句吧！蓋今國共之爭，實為中國政治前途最大的不幸，現在情勢既演至此地步，同時國共雙方亦已決心武裝解決到底，對和平統一的門好像是不開了。至於內亂什麼時候結束，根據一年來雙方戰果，軍事準備，以及雙方過去的政治組織，管轄地域和控制勢力上說，都不是短期間能夠結束的。就內亂歷史上看維持三五年或十餘年亦是有的；譬如吾國滿清時代的太平天國，在一八五〇年創立至三合會欲以滅虜興漢，勢力遍及全國三分之二，卒於一八六四年為湘軍撲滅，為時十有五年。再說美國南北戰爭是一八六一到一八六五年，前後亦有五年。現在國共之間形勢，其均衡勢力完全與上述兩個戰爭一樣。如果雙方同樣努力修明內政，準備軍防，這戰爭更不能三五年可視其勝敗了。我希望內亂早日結束，以免人民再受內亂騷擾離鄉背井的痛苦。

第二通貨膨脹問題：通貨膨脹的發生主要原因，即「貨幣價值依其分量增加之比例下落，而物價跳高，反之，貨幣價值依分量減少之比例騰貴，則物價下落」，這是經濟學上不易的原則。吾國貨幣於抗戰開始到現在飢見增加而膨脹，此為財政收支不平衡的現象，所以財政預算中赤字數目僅以增發貨幣來填補了，因此影響物價跟住高漲。但是物價跳動程度往往超過增發貨幣數額以上。譬如民國三十四年物價與貨幣之倍數距離相差不過，後經政府增發一次少數貨幣，則物價即跳二三倍，三十年前政府又發三四倍，物價却已跳高八九倍，等政府再發八九倍，物價又跳高十七八倍了，是見物價是跟住貨幣價值而跳動，而其變動是極不規則的。亦有物價跳動並不因貨幣價值的高低，有定期性提高物價；如八月漲風，九月漲風，十月漲風，似乎物價跳動還有其本身因素存在，實在這種定期性漲風是經濟動態中不良現象，雖然戰前亦常有定期性循環漲落之狀況，但其漲落並非病態而是正常，故不能與現在這種畸形狀態對比。我對於定期漲風的因素看法有四：

- (一) 人民對於政府增發貨幣實在數目發生懷疑。
- (二) 商品本身所負高貨利太重。
- (三) 游資定期匯合作祟。
- (四) 供求不平。

上述四種觀感中唯二三兩點比較重要，亦祇有此兩種原因刺激物價較劇烈。中國幣制截止今日還在動盪中，一面果然受到內戰種種消費的影響，一面亦即理財乏人。前者不談，後的我們不能不怪宋子文的失策，任長行政院時將九億美金和六百萬兩黃金糊裏糊塗的弄光了，如果現在還能保持幾億美元作為基金，則法幣的信用不致這樣低落，更不會如此狼狽地哀求美援了。現在中國好像一個病人，既不能生產又須費巨大醫藥費，這種情形能維持幾何年月！

一般人認為中國幣制前途很是悲觀；如果照目前這種情形繼續下去，雖然不能即刻踏上德國馬克這條路，將來亦許可能，此話頗有幾分理由。亦有人將目前幣制與德國馬克同等看待，這未免過份武斷了。因為我們所處環境與當年德所處環境完全兩樣。我們是勝利國，對於通貨並不任性摧殘，儘可能範圍內政府是謹慎處事，譬如請求美援，壓制物價，均對幣制變動有關係。就是增發貨幣亦甚小心，如這次印發新票十萬，四萬和二萬三種，政府為了大票免於充塞市面而引人心恐慌，儘量減少大票的流出。但是德國就不相向了；德國自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數年中，馬克價值僅增加十倍不到，換言之，馬克初值僅發三十倍，到一九一八年戰爭結束時僅增二百九十倍。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通貨忽告狂熱膨脹，物價亦隨之高漲。一九二三年一月法比聯軍復進佔魯爾區域，惡性膨脹才正式開始。當時人民對馬克已完全失去信用，凡存款無人肯留片刻，均以搶購貨物為本，商品漲價日有數十次，實開有史以來未曾有的通貨膨脹的大恐慌。德國馬克為什麼在戰後才開始惡性膨脹呢？唯一原因即應付失敗所損失的巨大賠款。從上兩個事實相互比較，我們看出德國政府是不顧馬克的前途，所以才陷落這滅亡的深溝中，而我們總不致這樣卑視法幣，至少限度還要保留它的元氣，這是中國通貨膨脹不能與德國馬克同樣看法。

最近政府有見美援能够成功，準備改革幣制。其實中國幣制須要改革，但不能在現在進行，因為內戰不停，整理財政，穩定金融為事實上所不

能的。同時幣制改革以財政收支平衡為原則，今財政收支既不平衡，幣制改革莫非枉費心神而已，不見有益反見有害。但是政府似乎知道這點，其所以力主改革，或許求得美援成功的一種藉詞。

至於我對於通貨減少膨脹的意見，即儘量節省開支費用，平衡財政之收支，增加生產，壓制物價，增加直接稅額，監視游資不規則的流動和作祟……等都是適當處置辦法。

第三農業建設問題：吾國素以農業為本位，目前工業尚未發達，增加生產當然要依賴農業了。可是中國農村已至異常衰敗階段了，同時農村裏一切生產工具仍用原始工具，此為今日世界上所未見到的一個最落後的農業國家。改進吾國農村，實為當前農業建設上迫切的任務。各國對於農村改革的辦法很多，吾人比較滿意就是蘇聯的集體農場，蘇聯的集體農場對於蘇聯於這次衛國大戰中貢獻甚鉅，至今英國還食涎着蘇聯農產品的豐富。蘇聯的集體農場自有其特殊環境，這就是蘇聯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一月兩次革命以後，掃除了過去封建時代所殘存的勢力，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將一切私有財產收歸國有的原故。在蘇聯憲法上第八條規定：「凡集體農莊所使用之土地，歸該集體農莊無代價無限使用之，即永遠使用之。」故其推行集體農場比較容易。同時國家於農業計劃的政策底下劃分地區舉辦大小無數的集體農場，人民站在有工作有飯吃的條件底下，遵從法令努力工作，故它有大規模的生產。

蘇聯的集體農場能給我們寶貴的，就是這點集體勞動的巨大生產。在歐美這個大規模的集體勞動是很少有，亦可說是沒有。並且這個集體農場的辦法在歐美亦很難行得通，這是歐美諸國經濟思想根據的不同。歐美以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為出發點；信仰亞當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穆爾等人學說。與蘇聯根據馬克思的生產工具公有說和列寧學說絕對兩樣。所以歐美農村的改革都是農民靠自己去謀發展，國家僅處在保護和獎勵的地位。但是歐美國家比我國富有得多了，今澳洲、阿根廷、加拿大、丹麥、瑞士諸邦農業技術及其耕種工具均早已現代化了，唯我國還遲遲保守原始的生產工具。我們的農業為什麼遲遲不進呢？實在農村制度不徹底改革，而政府所擬定種種農業建設方案，缺乏資助不切實際，當然對農業建設仍舊無補於事。

有人主張中國農業建設應採國營農場，這與蘇聯的集體農場和歐美的私營農場有一點不同，亦可謂是種適應中國當前環境的農業改革政策。可惜中國是地大人眾財力缺乏的國家，國營農場要普遍設立是沒有辦法，所以欲求農業加緊生產和迅速解除農民疾苦，我認為在國營農場之外，應提倡農民的聯合農場。以補國營農場不能普遍設立的缺點。

我對聯合農場的意思，已在本刊上期拙著「改進吾國農業社會的幾點意見」一文已有詳細說明（該文中所指集體農場公司化就是聯合農場的別名），這裏我不想再談。總之，我國農業社會的落後，生產的缺少，有下列幾個主要原因：

- 一、農民普遍貧窮。
- 二、文化水準大低以致缺乏農業技術上科學的智識。
- 三、新式農業機械不能利用。
- 四、社會紊亂及其他種種壓迫以致未能安心從事生產。
- 五、水利問題未解決及天災屢生以致生產損失慘重。解救辦法，在國家方面，一面開闢水利，安定社會，普及學校，舉辦農貸。在農民方面，彼此合作生產；組織聯合農場，利用現代生產工具。換言之農民把自己的那一小塊耕種土地聯合起來，變為建立在生產巨大和集體勞動基礎上的大規模的公司化的農業生產機構。唯有這樣才能消滅以往種種腐化的病態及澈底解除人民過着半飢半飽的生活。

最後：中國問題

徵古錄

· 徵明 ·

極多，上述三個問題僅為其中一部份而已，雖然在這三問題表面上不大聯繫，但總看出中國問題嚴重的一部份了。我們希望內亂問題早日解決，則通貨膨脹和農業建設的前途便不會使人憂慮了。

讓雖美德，亦有分際，人唾吾面，拭之可也，聽其自乾，不亦過乎？以此術治身猶可，若以治國，則國勢必弱，民氣必靡。南宋時刻地納幣，獻表稱臣，而不以為恥，此之謂懦，非讓也。必如文帝之柔南粵，斯謂之仁；武侯之和東吳，斯謂之智；漢之避楚，越之祭吳，斯謂之勇；有智仁勇而能讓，斯謂之忍小忿以成大謀，非包羞蒙恥之謂也。

節抄楊藏菴雲邊錄

# 我們能防止日本再起嗎？

· 梁夢覺 ·

## (一)

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的「安全」努力，終於因民主與極權兩大陣線的對立而宣告失敗。歐亞兩洲集團勢力，已公開由同盟方式在成長。尤其是西歐與東歐顯然的壁壘，正在爭取勢力圈的鞏固與擴展。因此聯合國這個名詞事實已不存在。已由聯合而分裂對立起來。所謂對戰敗國德日關係的「清算」，和約締結問題。在西方對德問題，英美法佔領區的統一機構醞釀，顯示德國已瀕於兩方勢力長期分治的命運。在東方美國宣布南北韓統一談判中止，亦同樣側面說明美蘇妥協已不可能。這東西兩聯形成的整個世界局勢，很清晰地在向三大大戰的邊線推進。舊賬不必算了，將舊賬轉入新賬，德日復活的机会於是到來。當克里米亞，波斯坦會議決定了解除軸心國武裝佔領德日五十年之後，兩年來的國際形勢轉變，使那個決定完全玉殞香消。而且，敵對的雙方都在儘可能的培植他的佔領國，希望它變為一個自我平衡的前衛。佔領軍的管制方針，由嚴格而放任，至於懷柔利用，日本表面受美軍統治，實則樂得投入美國懷抱，藉美國的「民主」精神，對蘇假想敵，轉變成美國附庸國單位之一，既可一洗西「辱」於華之恥，又可重溫反共，北復蘇聯之仇。於是日本再起的時機逐步成熟。

我們不必奢望十一國委員會或中美英蘇四強對日再有如何的硬性決定，以防止日本再起，法西斯主義的復活。基於現階段事實的發展，所謂「管制」政策，早已由美國改為「扶植」策略。兩年來日美之間逐漸化敵為友，互相適應現勢，造成一種交歡的傾向。首先我們談到的是日本的改革。從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的大選來看，那根本是被動的「民主」，在美國軍憲監督下舉行投票，棄權者達二成以上。說明日本人對「民主」趣味極低，對政黨的獻媚美國也表示不信任。他們心目中，依然是「天皇至上」。在這次大選中，全國三六四黨中參加競選者，共二五四黨。其中，五大黨的當選比例是自由黨佔百分之三十三（二四一人），進步黨佔百分之二十（共九十三人）社會黨佔百分之二十，（共九十三人）協同黨佔百分之四，（共十四人）共產黨佔百分之二，（共五人）其餘各派佔百分之八（共三十九），無所屬者佔百分之十七（共七十九人）這裏更明明白白表明保守派擁有壓倒的優勢。因為「自由黨」即是「民政黨」的化身，進步黨乃「政友會」之改裝。其無所屬的七十九席中，大多數是保守份子。所以戰後日本的民主議會，仍充滿了舊官僚、財閥、軍國主義者，元老操縱的氣息。在經濟政策，賠償問題，天皇制度等事，日本人很聰明地在適應美國人口味。儘量的把傳統本位主

義，侵略思想，封建制度壓下去，而處處以偽裝的「民主」姿態出現。實則君主立憲的舊制，在天皇制度未廢除時，實行「民主」根本是矛盾的。日本共產黨員拒絕天皇召見，以及廢除「鞠躬」改為握手，都是枝節的矯正舊制，而且，還並不是證明日本的民主化，反而表現其虛偽替保留皇制留餘地的謀略。試問，如此「民主」，他們的「皇道、王道、神道」即算終止了嗎？充其量祇可以欺騙美國人的耳目而已。次則，我們再依美國對日態度分析，從米蘇里艦簽立投降契約之後初步的面孔相當嚴肅，對美國軍人之接近日本女性，以及戰犯之逮捕審判，都很認真。保持嚴格管制的原則，一年以後，美國人看到日本馴順可愛，於是態度趨於和緩，美兵可以娶日婦歸國了，戰犯停止檢舉且可保釋了。麥帥的「太上統治權」漸漸移交日本「國會」兩年以後，美國人在東京轉為客卿，受着日本人全國上下的恭維獲得「隆盛」美名。至於今日，具體的事實是美國由替日本「開脫」而入於「援助」階段。譬如日本對外貿易的開放，食鹽、煤、漁業種種必需原料對中國大陸的吸取。通過麥帥的支持卒告實現。日本的物資貧困遂告解除。但美國為再建日本工商業起見，更決定了一個新方案，即是用五億資金貸日，（比援華來得痛快）同時，還準備接受日本政府要求，開釋大批戰犯。在美蘇

形勢日趨緊張聲中。這是美國對日政重轉變最現實的證據。

就在這種形勢下，日本再起的趨勢試問我們如何予以防止？

(一)

日本再起最切要的問題是恐怖勢力能否復活問題。那麼，我們不妨就目前日本國內潛流不息的政治暗潮加以剖析，便可知曉：

誠如前此所指出，投降後的日本政治亦與其他國家一樣陷入左右翼勢力互相傾軋爭鬥的境地。這樣使扮演「民主」化的自由與進步兩黨頗感不安。現內閣即遭逢着此一難關。民主黨及社會黨內之左傾份子，與右傾份子，正互相矛盾，而在朝黨內之不統一現象，亦暴露其掌握政權的無能。片山哲蘆山均之命運是以危如累卵。從最近的情勢觀察，日本政治內層極顯地擺出左右兩大勢力的趨於兩極發展。在各政黨左翼勢力的聯繫趨向下，共黨無疑的獲得領導地位。共黨乘日本戰後社會乏困大眾饑饉之空隙，積極展開把握工農羣衆以反對資本家的政府。進一步向社會民主黨，協同黨，社會黨等政黨進攻，爭取其左傾力量的樹立，以分化其黨的統一實力，企圖瓦解這些中間政黨歸入共黨的陣營。因此，近一年來日本政情之不穩，說明共黨正在拚命擴張其實力。北鮮與北滿的「日共」當然頗有支援引導的影響。

但與共黨針鋒相對的另一個極端勢力，「保守派」也不甘寂寞。這派的勢力歷來即是左翼的死對頭。在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有着傳統的基礎

，投降並未使其受到什麼大的挫折。這派可以新成立的「革命黨同志會」(以補正誠之，菊水垂訓爲主幹)與由「黑龍會」化身的「新銳大眾黨」，「日本革新黨」三個組織爲代表。讚隆盟總政策的轉變，潛伏活動在地下狀態，他們以「國粹主義」的保皇，反共，民主三口號，適應日本人的忠君愛國思想。因此，未被肅清漏網或喬裝民主的舊軍人，官僚，財閥，買辦，地主，武士道等階層份子，都自然的秘密參加了這個組織。爲避免耳目起見，他們活動的中心區域設在北海道的偏僻地方。如所謂「神兵隊」「大東塾」等訓練與武裝團體，充分表現着「復仇」，「復國」的積極意向。由其口號與行動看來，極端的國家主義，法西斯式的右傾態度，在日本鄉村擴張的結果，只要時機一到，軍國主義即能立刻抬頭。暫時的向「民主」低頭，「臥薪嘗胆」是他們唯一的主張。他們內而保皇，堅持「八荒一字萬世一系」的成見外，而絕未忘情滿蒙中國大陸的佔有。所以，這種保守勢力形成遠東「民主政治」未來的一種恐怖預兆。

依此推證，日本民主化在最近未來實屬一過渡變態政治局勢。一個民族氣質如此走極端而極權傳統觀念又深的國家，實行民主，在風俗習慣文化思想上，實毫無具備主觀條件。反之，假定共產黨不成功，即是法西斯主義的再起。日本政局的歸趨同樣要決定於美蘇關係的最後清算，殆無疑義。

(三)

我們今天不可固信日本工業生產的毀壞，如

以第一次大戰國後的德國爲例，十五年後又躍躍而際於獨霸歐洲的強大，即不難揣想日本的再起是怎樣容易迅速。我們最應該深刻計較的不是這一個，而是如果日本一旦再起，中國又將如何？事實很顯著，中國沒有力量防止人家的復興

，中國戰後正在民主與極權(廣義的)矛盾鬥爭的情況下謀出路。如其中共失敗，十五年中如再遭過去，毫無成就，日本重新君臨中國的可能性，無人敢予否認。在主觀條件客觀環境雙方面，中國都不及日本的完好。爭取政治經濟建設的進步，我們可視爲今後絕無外患唯一的棋着。因此，想防止日本重來中國的關鍵，不在消極的如何制裁日本，剝奪日本的工產生產力，主要的還在我們能否乘此時機發憤圖強。從國際形勢上着眼去看，今後五十年我們的國防重點似仍在東北與西北。在現代化的科學競賽下，我們的政治經濟基礎，與戰敗的日本仍難相比擬。我們覺得如此空喊防止侵略，最無意義。國際敵友關係本以利害爲前提，義大利西班牙往日皆曾爲英美之敵，今且已變爲西方民主陣線中單位之一了。美國爭取日本，如依此角度觀之，即使日本法西斯主義度再起，如南與英美美安協，亦絕無傷於英美對蘇的政東。英美又何必非強使日本廢除天皇不可。今日美日互相利用的跡象與日俱露，美國重視日本藐視中國，前途演變，殊堪發人深省。

由此，我們獲得的結論，中國無法防止日本再起向我們復仇，除非我們自己革新。



## 文化工作者的歷史任務

·李兆建·

記得我們祖先曾把忠恕仁愛給我們做了文化的骨幹，漸漸變成了民族的血液，凝成了民族的靈魂，其後經歷代勇敢的排拒與吸收，我們的文化底子愈益深厚了。在這個古老的大地上，不論是在江南蕩漾採蓮、漁歌唱晚，或是在華北平原，胼手胝足，驅牛趕馬，不論是北平的靜悄悄的红門掩映，或是蘇州的小橋流水，我們都會寄與無限的愛戀，因為那裏有着人類的溫暖，有着我們民族傳統的和悅與恬淡，另一方面，我們固然不非薄孔孟之道，周公之禮，也鍾情於秦磚漢瓦，雲崗石刻，燉煌壁畫，因為這一切都表示着我們先人吸收異族文化精髓的勇氣魄力與寬容。

同樣在時代激流衝擊我們覺醒之後，我們也取得了世界上最進步最合理的政治體制，我們也熱烈的迎接着機器電化醫藥……，所有的科學。更企望着世界新文明的精髓——民主和自由。我們也要繼承先人的精神氣魄來勇敢的吸收，做爲我們新的血輪。

然而我們太不長進了，唐代有把西區的馬和葡萄雕在銅鏡上的氣魄，我們後人都只知閉在狹小的籠裏，經過時代洪流一再沖洗的民族，却無趕上時代的決心。科學與民主是與中華民國有生俱來的，但卅幾年來只聞新殺之聲，何嘗有片刻培育這新德性。一向用以自詡的道德，老早在混亂迷昏中蕩然無存了。禮義廉恥還須有人在那裏大聲疾呼以倡之，被視爲蠻夷之邦的反倒恪守做人的道德而不失。是以中華民族的脆弱倘再斤斤於機器文明與道德文明之辨，已屬笑話，論民族性的差異也非的當。我們應直接意識到我們民族現正處在真空時代，舊道德早經崩潰，而新道德新精神一直不能屹立，民族的精神無地可託，深厚的文化基質既不能被導引做爲生命的推動力，瞻望前途又絕之可以寄放理想的美麗遠景。於是人們就浮搖不定的翻滾於人禍物禍之中，使這個古老國度呈現着動盪與不安。

這個民族的生命將如何持續，現在正是一個急需檢討的時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決不是治療這半癱瘓國度的根本辦法。宗教家的神的觀點

，我們嫌其玄渺，而純由物以論事，又不免陷於機械，然則傳統的文化脈絡與新的文化血流不能接合，此病將從何謀其根治？

目前的混亂倘若僅單純的歸之於政變與主義之爭，我以為還不如歸之於人性與物性之爭，要求安甯與進步應該先要來恢復人性。無論是像宗教家由神以論人的說法，或是像中國早已有的本性的民主義就人而論的思想，都是一致的要求人類發揮其善良明理的本性。民主的精神也不外是給予人一個合理的地位，確認人真是人，不是可以隨意捏塑的軟糕。世界第二次的大屠殺由原子彈而結束，但原子彈的發明者卻在那裏企求人類互愛，人性的絕滅是世界唯一亂源。

而所謂人性的恢復，應該即是仁愛與明智的擴張增長，合理與自由的培植發育。這種人的基本德性和人類應享的基本權利，在任何時代都會被湮沒埋藏過，但却終是暗而復明，爲人類生命最明顯的表徵，中華民族幾十年的生命活動所表現者在此，我們所企望着的新的精神也在此。

我們知道自先秦以來，各派的思想能切實滲入中國人血管的，獨以儒家。流弊自然難免，但其功能確能使中國人懂得了人之道，恬淡中有積極，從現實的適應中謀存在，而不像西洋的以神爲依附，甯可從文學藝術中求自適，而不從宗教上尋慰藉，這一種純人之性，便使中國民族始終持續綿延，屢屢困厄而不滅，在苦難中堅強的生長，因爲早就有着一種人的信念人的力量，這種特質便能使他寬宏的接受了外來的思想文化而不離本宗，經累代的加深積厚便成功了我們豐富的基業。可惜的是現在又隱而不彰了。

所以當前之務，在求治本。軍人政客大黃金固然有其事實的需要，而向遼遠處望去，我們自救的途術應該是發掘民族的精神寶藏，尋找民族被湮沒靈魂，亦即是從綿遠的生活痕跡之中認識其獨有的文化傳統，攝取其特質，從而宣揚恢復之，使我們民族重新認識自己，確定自己，恢復其

自傳力，充盈其生命力，刺激其時代的覺醒，鼓舞接受新文化精神的勇氣。

繼承過去，開闢未來，正是現階段中國努力的途徑。五四革新運動是個序幕，常不免矯枉過正，今日中國經過八年更艱難的磨鍊，認識應更清楚。在走上科學與民主的道路之前，這個努力應是必經的歷史過程。

因之，我們首先要求文化工作者勇毅的負起他們歷史的任務，以其高超純潔的靈魂，智慧仁愛的心，担当繼往開來的文化使命，忍受精神的迫害與物質的壓榨，沉重而積極的表揚這古老民族的優美靈魂，引導社會覺醒，啓出愛與智的增強。

具體的說，我們企求一切的文學家藝術家詩人宗教家學者，都本其良知，認清了時代，確了自己，凡所表現於著作，聲音，文字，色彩，線條，形體的粘合民族精神與新文化的空際，要具備這個意識而後始能談判技巧形式與方法。所以在當代文藝作品之中，我們並不以一些作家專事暴露現實醜惡的一面為滿足，而更要求多表揚在困苦中謀生長污濁中保清白的一面。因為這才是真正民族德性的表現。諱言醜惡，也會給堅強者以沮喪，而死要求生可予懦弱者以激勵，何況那還是民族優點的表现。

同時，文化的吸收，應以傳統的文化背景做底子，否則抉擇無主，去取難定，不是只得皮毛，便是空無所有，漢魏隋唐的文化，乃是今日文化的神髓。而今日無論文章圖畫其形體空疎氣象萎靡，都是不能接受昔日精神之故。先人有排吸的魄力，而我們今既只知數典忘祖。倘能了解繼往開來承先啓後的意義，則今日文化工作者，實應有先正確其意識的必要。

基於這種感覺，我們又深深憂慮到文化人的偏頗的趨向。超然一切應是精神活動的正確態度。因此我們除了要求文化工作者正確嚴肅的擔承其使命以外，我們還更需要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如何以卓越的明智，體認過去，觀察現實，而指示給人們正確的途徑，規定各部門工作的前進方向。無所偏倚，無所愛憎，一唯民族的安甯與樂為依歸。

猶記清初的明代遺老，痛遭國變，遂窮究經義，致造成有清一代樸學之盛，而其初衷，却是在於藉考據以明經義，由經義以解民族精神，淪陷期間，陸志章博士在北平敵人文視之下，大提倡聲韻的研究，其本意蓋

在由聲韻以了解中國民族的語言，再由語言以認識民族心理。都是在艱難的處境中，而寄其生命於文化事業之中，期為民族國家之助的。現今並無敵人，但禍亂內作，政治與經濟對文化的阻力極大，文化工作者物質的缺乏與精神的苦悶達於極點。可是一線光明却偏隱隱現於他們之身，以殉道的精神開創民族的新生之路，這是他們值得驕傲的任務。

我們的友人司徒大德曾經基於宗教的見地諄諄教中國人不要失掉「希望」。言辭含蓄而玄渺，難使讀得發昏的中國人了解。但我們深感這並不是空言慰藉。失掉了「希望」的民族是不會有前途的。我們長遠的生存歷史，證明我們有着活下去的力量，我們要急速的找回來失落的「自信」和「希望」，混亂應是歷史流注，是大洪流的表面泡沫，歷史終有其應走的路徑，我們要急速的認定這條路。

在苦難的角落裏，不難尋見為文化的繼承與發揚而孜孜不倦的人，而且文藝復興的聲音也偶然響出了，這都是可喜的。我們甯願棄掉一切願望而只寄美麗的憧憬和熱望於此。

### 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 交通銀行

(業務網要)

存款匯兌

放款貼現

儲蓄儲券

信託保險

倉庫運輸

實業投資

總管理處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電報掛號 九八一七  
電話 一一三五〇四  
一五五三六

上海分行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電報掛號 六五二七  
電話 轉接各部  
一三五〇四

信託部

上海 九江路六十九號  
電話 一一〇八二八  
一四六四九

分支行處遍設國內外各埠共二百餘處

# 中國歷史上之地方政區(續)

·社衛·

## ——中國政治制度史談之三——

由此說來，兩司還可以說是府的上級機關，而道則不過在當中多一番承轉而已。（例如省會地方有首道，又有首府，有首縣，真正有事，多半找府縣。首道每不爲人所重，他只坐着等機會升臬司罷了）。一個州縣衙門辦起公事來，是詳本府之後，本府詳本道，本道咨司詳院，若是重要點的事就要除詳本府之外分詳道及藩臬兩司督撫兩院，（清末裁去同省的督撫方不至於要分詳督撫兩院。分詳則兩院的批示不同也很爲難的）。層次可謂繁極了，究竟誰是真正主持辦法的人呢？恐怕真正當衝的，下頭就是州縣，上面就是督撫，事實上有什麼話也只有督撫示意兩司行府轉行縣。還算府是一個比較能指揮州縣的，然而也微薄得很了。

從歷史沿革說來，誠然府本來就是漢的那，所以府縣確是地方行政的兩紋，不料到了明清，加上這許多的帽子，（明朝還有巡按御史一種介乎督撫藩臬之間，尤其複雜，幸而清初把他廢了），使層次與職責均不明，不能不歸咎於明太祖立法之不善。所以顧炎武深慨於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差不多督撫司道全是治官的，賸下州縣一級，又如何能責成其治事呢？

再看州縣衙門的組織。明清州縣有三種，一種本身是州而兼轄旁縣，一種州而不轄旁縣，一種就是縣，品級也各不同，而直接管民事爲地方行政最基本的單位則一。這種官流俗謂之胥民社，謂之小諸侯，謂之父母官。無論從民間習俗來看，或從國家制度來看，倒也都都很重視的。州縣衙門是一方觀聽所寄，代表國家治權所在。雖然歷代相沿下來，多半是破爛陳舊的建築，然而從儀門起，而大門，而大堂，而二堂，中間一條甬道，兩邊排列三班六房的書吏衙役辦公處所，大堂擺着公案，案旁高架供奉印敕，（只有真正地方官才有正式的大印，其餘大的謂之關防，小的謂之鈐記，都不是印。所以州縣叫正印官。敕是載明職掌的敕書，這是具文，沒有人看的）。在審問重要的案子坐大堂時候，大堂站滿皂隸，拿着刑具，無數戴紅纓大帽的人簇擁一個官，高坐公案之上，公案繫着紅草鞵，案上陳列籤筒筆架硯硯，堂下旁聽的人是不禁止的，雖然並不整齊嚴肅，而在老百姓看起來，總覺得代表無上的威權不敢觸犯。所以俗話說「滅門的知縣」，怕官的心理是多年所養成的。

但是怕官的無非馴良的百姓，至於刁健的紳士以及靠衙門吃飯的人，如劣幕蠹吏與訟師地棍之流，其實他們胸中了然於官之無能爲，正好利用官的一種虛聲，來恫喝良民，飽其慾望。因爲官是朝廷派來的，他孑然一身，又不曾帶得親信的武力，還不是靠本地捕快衙役替他拿人？他未必懂得例案，未必能親自動筆，還不是靠幕友及本地的書辦替他辦稿？他更不知道本地的情形，還不是靠本地的紳士替他做耳目備諮詢？紳士中之賢者自然只能在地方大利弊上頭向他建議，至於出入衙署過從親密的，還不是土豪劣紳？所以名爲一縣之主，其實就是地方上的壞人在那裏招搖玩弄，名爲官治，其實就是土豪劣之治。名爲尊朝廷，其實把朝廷的尊嚴早已褻瀆得掃地無餘了。像清代的地方政治，與其說在官，不如說在胥吏與紳士，所以殘民以逞的既不是君主，也不是政府，而就是本地人，就是人民之中壞的在那裏欺負好的而已。看到這種情形，方才知道隋代之廢胥官不是無因，而宋代之差京官知州縣也並不是澈底的辦法。探原立論，非得人民的優秀分子能以出頭參加政治，無論何種制度都是託諸空言。所以西漢的那

縣吏能有進身之階，幾乎全部優秀分子非服務於縣不可，這究竟是彼善於此之一法。

漢以後一個重大的錯誤，是沒有特地地方衙署定出一個組織。看唐代的州，除長史司馬爲其佐官外，屬下有幾種的參軍及佐史，縣則丞爲佐官，主簿爲其總務科長，尉爲其保安科長，錄事司司法等爲其各科科長，還算有一個規模。而州縣的屬吏也都是士流，不像清代府經歷照例由縣承主簿典史都是雜職，其品級低至從九未入流，凡是讀書能上進的人都不屑幹的。他們作祿已經微薄得無以爲生，還要攜妻子不遠千里來到任，名爲一命之吏，簡直是與乞丐無殊，這班人多半是吏員年滿議敘，或捐納得來，自然還想要發幾文財，他們既毫無能力，又無正當志趣，何能在衙署裏認真盡職，其不堪言狀可想而知。至於真正衙署公事，就不得不請教本官請來的幕友，以及帶來的官親子弟，甚至於雇來的長隨，叫他們當門上，當稿案，經手公事，傳達命令，掌管銀錢，其間上下出入，營私舞弊，本官之不肯者不免須領爲奸，就是安分的也斷不能風清弊絕。爲什麼呢？國家定制既沒有替他預備手下辦事的人，而要他自己帶人，他本身的俸給還不足用，又拿什麼薪給來用人，豈不只可聽他們作奸犯科麼？在政府一方面，好像把縣政責成縣官，而那些佐雜則只是聊以點綴。並不來苛求的，至於縣官怎樣辦事，並不過問，說穿了就是包辦性質。只要於正款無虧，無論你用多少人，用何等的人，如何用法，都非國家法令所問。那麼縣官豈肯掏出腰包？只好少用人，用壞人，聽他們要錢而不辦事了。民國以來，雖然縣政府有祕書科長及各局局長之設置，然而也是在極微薄的縣行政經費的勉強支配。縱使要錢的風氣好些，而靠他們認真作事，也還相去甚遠。

縣署本身的組織還是不能完全直接影響到人民身上，比如收錢糧辦命盜案，仍須在鄉村地方找出負責的人來，這就要靠鄉約保正這些人。唐宋以來，這都是由官指定的，硬叫他們當這種費力不討好的苦差。政府要徵集人夫，要徵派官物，不能一家家挨門去要，就責成他們去辦。地方出了命案盜案，又是他們倒鑿，緝凶緝盜，官差又好來訛索，能送錢來還好的，不能就挨板子了。一切行政必需的費用，比如解犯人，備公館等事，政府是從沒預備這筆經費的。差役還能自己貼錢麼？自然又是地方的事。試問他們如果是善良的，何能經得這般賠累？自然又是些不安分的人出頭，拚着伺候官府，藉此向老實的人民攤派勒索。嘉慶中有御史賈元中奏云：各衙門需用等物總取諸行頭，行頭分歛於舖戶以應官差，有自來無價者，有半價者，吏佐人等借以作姦，用一取十。不過這些人究竟總是地方上有身家的，難道真無鄰里之情甘心欺侮良懦而樂此不疲？也無非實逼處此，無所控訴，不得不有一個人來搪塞罷了。

上面已經說過，人民切身利益無如有冤無伸。口角爭鬥，是人情常有之事，最好是勸諭和解，息事甯人，不得已則使之各得其平，勝者不至於驕，敗者不至負屈。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幾千年來始終是這種情形。從來講政治的也都注意這一點。無如地方官署的組織足以變成磨練訟事爲生的人。因爲有幕友，所以喜歡舞文弄法，因爲養了許多的書辦差役門丁，所以歡迎人民與訟以便敲詐需索。此外地方的訟棍兩下教唆，地方的生童恃勢包攬，失意的文人則以寫狀詞爲生，衙門口的店舖則以招來食宿買賣爲生，只要有一點機會，大家如蟻附羶，紛紛都視爲奇貨，非害得人家破產不罷手。尤其是錢財爭訟，所以兩面訛索，遇着不肖的縣官，更是明目張胆的受賄，古今講吏治的書，對於這種事也說得很透切了。

注：汪詭論作縣云昔嘗有賢令於民之爭訟召至案前委曲曉諭使知爭訟爲害和好爲利且曰爾歸自思如果有冤必不可忍若明日復來我當爲汝申理後不復來矣蓋爭訟不過一時之氣氣過即平其有必不能平者俟其再來然後爲之申理蓋即於准詞訟之中寓息訟安民之意斯得之矣。

再說清代對於州縣官的老成也未免定得太苛，尤其是命盜案，限期緝獲，辦得非常雷厲風行，經過幾次限期，就要革職，這個名稱，叫做三參



四參。於是州縣官自願考成，第一就要掩飾，或是重的情節擅改為輕，或是隱匿不報，但是諱盜又是一個處分，所以不得已就有頂凶之一法，買人來混充凶手強盜，還算好的，甚至於誣良為盜，就更不堪設想了。然而不肯官更更大妄為，真有這樣作的。不在此也，他們因為積案不清，又是有干吏議，於是不問情由，一味威嚇，或嚴刑逼供，只求速就審結，不管是不是情真罪當，所謂屈打成招，更是常有的事。漢朝人已經說：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東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又說：「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後來刑訊逼供正是拿漢朝的習俗運用得精益求精，簡直認為天經地義，其非理刑罰為人所不忍出諸口者，至今猶在見聞記憶之中。儘管社會流行思想着重因果報應，然而無奈一班愚民所想像的冥間地獄，就是牛頭馬面刀山油鍋，與他們所見的人間官府的慘酷情形彼此互相映發。不但少能啓發仁厚慈祥的信心，徒然使治者都看慣了殘忍的行爲，養成一種不可救藥的惡劣風氣，消極外觀冷淡酷烈，以至廉恥與情感都消逝到無何有之鄉了。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威嚇到了極點，刑罰也失其效用。所以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這句話透澈極了。不過在孔子的時代，還不至如後世之甚，所以這樣說。自漢以來，則既不道之以政，而徒齊之以刑，民既無恥，而又不能免了。在中國政治思想制度上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凡有一種教弊之法，弊即隨法而生，弊即隨法而更甚。盜案嚴參之法，本來所以求破案以安良，這樣一來，不但良不能安，反而多害了些良民。至於官吏，也不但不怕考成，反添了些逃避考成的方法。西漢的吏治已經算好的了，而武帝末年已經是這種情形。史上說：「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貪酷二字相因而至。後世的酷吏不是漢朝人慷慨好事之比，也並不是天性好殘殺人，不過因為要顧前程，圖升官，要見好於上司，所以酷吏也就是貪吏。州縣官如何可以不貪呢？他的俸給，他的辦公銀兩，（如所謂紙張張銀）何能維持他的衙署及其府屬之親友鄉丁？何能供給官場體統所必需的衣冠服御？更何能隨時應酬相習成風的上司節壽？（本府本道兩司及督撫都要送什麼三節兩壽，都是現錢）。他們受餽贈，也是非法的，所謂與受同科，但他們局面更大，需要更多，不從屬縣取得，又何能靠那點俸祿與養廉維持體統呢？至於首縣或地當衝要之縣，要伺候各級上司衙門差使，要供給督撫的閱兵，欽差的查案，學政的科歲考，以及各種客官的過境，備行轅，備酒席，備戲，備犒賞，備車船夫馬，還要軟硬兼施，點綴應付那班隨員巡捕門丁書差家人，一天到晚忙的就是這些事。王杰奏云，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滿漢酒席種種糜費，并有貪緣送之事，隨從家人有所謂抄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廚等項，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就應付這些，而不想法子額外生發，已經是清官了。何況冗官所爲事，他們又怎能不有點私的打算？叫人作事而僅能免於凍餒，又豈是人情？在以往論政的人，也未嘗不太痛恨於這種現象，所以官樣文章總說是戒兩規。添養廉。但是規而口誦，足見其不是官力所能禁止的。試問政府能不能將大小官署辦公應需的物事統通發價自辦？又能不能將大小官吏的報酬加到可以使他們事父母養妻子而有餘的程度？從理論來講，這是應該而且可以的。但是中國政制的習慣向來不是這樣的。社會制度也不是這樣的。不但於古未之聞，恐怕於今還未之能行也。經世文編有周錦上制軍書云：今州縣廉作多者千兩，少者五六百兩，以之延請幕友向慮不敷，加以養父母養妻子，僕役之供饋，差使之往來，上司之應酬，親友同僚之贈答，皆人情事勢所不能已者。又其蒞任之初，以及交代查案銷刑報等項，由府房以至司院各房，隨舉一事必有一規費，準之廉俸，不啻數倍。

州縣官的貪酷，決不是一個人作得出來的，也並不是他帶來的人所單獨作的，因為他們只有空的聲威，究竟沒有實權。就是書辦差役，也是狐假虎威，重要關鍵還在劣紳。不肖的官與劣紳，必須互相利用，互相勾結。假使紳士都能持正，則地方人民利害所關，輿論國法的力量自然都可以運用起來。消極的說，人民不受官府非法的命令，官府又將如何？積極的說，紳士公稟上司，州縣官必站不住。然而事實上正派的紳士安分守法，

不肯預聞地方公事，不肯與官府往來的，總是少數。而官府偏喜歡向劣紳勾結利用，甚至於求教項主意。官與紳本來是一鼻孔出氣，因為官退下來就是紳，紳又可以作官。官紳的對象都是人民。在明代，江南的紳士勢力最為浩大，不但將一切負擔推在平民身上，還要利用官勢種種剝削。於是國家正供在人民是加倍的獻納，而政府却只能減成實收，所以富不在國，不在民，而在官紳。日知錄也曾慨乎言之。清初對於江南的紳權痛加摧抑，稍為斂迹一點。然而隱持官府短長以致地方官不敢不曲意敷衍，還是各省通病，尋常以近代的縣政為官治，恐怕還未必確。與其說官治簡直可以說是紳治。

人民對於政府所厭納的，可以說重負不堪。但也可以說政府始終是輕徭薄賦的。清康熙五十二年下詔永不加賦之後，正式錢糧的確是輕至無可再輕。而且一遇荒年或其他事故，動輒蠲緩田賦，其積欠有年者也多以一概豁免了事，鹽黃布告，煌煌在目。殊不知正式錢糧以外的攤派不知已經暗中增加多少倍？區區減免錢糧，那有什麼益處？何況這還一點恩澤也決到了民間。等文告頒行出來的時候，早被糧房差徵去了。表面上說是退還，或是下次起徵時扣抵，試問小民誰知道這些講究？官差說該要多少，不另外加多已算很公道，還敢希望少要麼？清朝的官文書動輒說我國家深仁厚澤，要靠這個使人知道感恩，也太可笑了！

州縣衙門徵收錢糧又是大弊費之所在。銀色糧解之挑剔，隨封之勒索，串票之留難，火耗之浮收，以及下鄉催征之需索供應，明清兩代討論這些問題的文章不知若干。最大的病根，是花戶地畝賦則沒有切實詳明的簿冊。官既不知如何徵收，民亦不知如何交納。只憑糧房書差私有的祕本，縱任他們把持蒙蔽，魚肉鄉民，而真正擁有良田萬畝的富家反可逃避重稅，反過來說，黑地漏稅的必也不少。這個問題非俟土地清丈辦理澈底完竣不能解決。

州縣官的做法，可以影響社會風氣。因為他們必須善於裝點虛偽的面貌，博取各方面的歡心。即對於部民，亦須恩威並用，剛柔兼施，一味慈祥體憐固然與上述各種環境不合。一味嚴峻，也要激起意外的反響。對於同官則敷衍拉攏，八面玲瓏，對於上司則卑躬屈節，奉承迎合，語言則含蓄吞吐，應酬周旋，聽於無聲，態度則趨避進退，諱小慎微，動容周旋，工夫純熟。一言以蔽之，養成嫻媚的習俗，將古人質樸勁健果敢骨硬之風一齊拋棄。道光末年，曾國藩最痛恨這一點，他後來帶兵，力矯官場習氣，深以鄉勇沾染官派為憂。曾幾何時，而湘軍將帥分任疆寄，又無一不是暮氣沈沈同流合污，甚矣滿制不修之為害於人心風俗。這還是就消極方面言之，最壞的現象就是妨賢蔽能，徇私害公，俗話說的好，『官官相護』，有了這種情形，則布滿歧路的都是貪王讒夫，這不是僅僅改換組織更名稱所能挽救的。而尤以外官為不可作。其對於政治進步之障礙可謂甚大，這不是僅僅改換組織更名稱所能挽救的。

地方官府的弊病如此之大，不能不說中國史上的一個最嚴重問題。人民受害到了萬不能忍的時候，便挺而走險了，漢末黃巾是對於官官權力下的貪官一種反動，這還可以說其中含有思想問題，社會經濟組織問題。北宋末年，方臘動亂之後，繼之以宋金之衝突，當那種異族壓迫之際，而自兩河山東進東西以至湖南江西福建，無處不有羣盜，幾於與南宋相終始。足見當時吏治壞到極點，民生苦到極點，所以人民並沒有敵愾之心而只有抗官之心。水滸的一段傳說，就發生在北宋末年，其反映受害的人民痛心疾首於貪暴官吏之深切，在已往好像沒有這樣的民間文獻。元末的羣盜，無疑的也是由於官吏之黑暗。明代的劉七唐賽兒王鴻儒以至最後的張李種種行為，顯然看得出完全是官逼民反。清代自乾嘉之間開始動亂，一直沒有停止，其為貪官蠹吏無賴差役所激成，更是衆口一詞，看王三槐的供詞，已可見其一斑。判這步田地，簡直是地方被害的人民與狐假虎威的地方劣紳差役捕快之流拚命的決鬥。所以川楚一役仍是倚賴鄉勇奏功。何以鄉勇肯食這一點不可知的薄賞而為政府出力打本鄉的人呢？他們也感覺暴民的

報復手段太厲害，不能不起而自衛。至於民衆的暴動往往是激於一時的憤慨，並沒有最後目的，知識程度有限，也不知道組織及運用的方法。無論如何智勇兼備，到底無所歸宿。幸運的招降了事，不幸的就徒然犧牲而不免悲慘的結局了。古今所謂民衆革命運動，失敗者居多，能有相當成就者也是極少數。因為究竟不是有組織計劃之運動也。

由此看來，中國政治有兩種矛盾情態，其一是治者與被治者之間關係不甚分明。被治者究竟情願受統治呢，還是不合作呢，或是對抗呢？治者究竟是取干涉主義呢，還是取放任主義呢？大概治者是放任的而被治者是不合作的。如果這樣，則二者之間可以說關係極少了。其二是政治象徵之堅強深厚。儘管動亂頻繁，威信動搖，而已成之局殊不易推翻。被治者處於一種靡落黯淡之行政權力下，仍然維持着若即若離的信仰，並不立刻十分感覺混亂。實言之，無論如何不良的政府，也還可以行使其權能到相當的程度，這兩種矛盾的情態，也許是似相反而適相成的。

## 關於中國政治制度史談的討論

本刊讀者訥庵君來函

「主編先生：貴刊連載杜衡君中國政治制度史談，讀之深佩其瞻博，近日各雜誌不乏歷代掌故之紀述，但有系統，有根據，以近時治史之眼光，窺昔人理國之用意，如此文者，尙不多觀。甚望貴刊陸續刊登，以餉同好。

文中間有可資商榷之處，不揣冒昧，擬爲提出。在一九九期文中言：「清制『奏事處將已閱之奏摺分別整理』」一節，「奏事」二字，恐是「軍機」之誤。蓋外奏事則待衛充之，僅原封交內奏事，內奏事則奄人充之，直達御前。帝閱後即置一黃匣內，由內奏事巡查交軍機處，奏事處人不特無整理之權，且並不敢窺視也。

又清制：誡吏奏報，無不批咨。除原摺由軍機處抄交閣部外，即仍包封由原摺差查閱，年終照例將硃批恭繳；其各部院者，封奏例不發還，而當日即由軍機處承旨片交遞閱，是原摺摺者，必知其下文也。惟言官（講官，台諫）自遞封奏，其或留上，留中，或交部核議，或廷寄各督撫，彈章則用「有人奏」方式交查辦，原摺片者抄給閱看；皆由軍機處承旨辦理，並不知會具奏之本員，除內閣奉上諭謂之「明發」，或傳旨申飭，或原摺還外，本人皆無從知其結果。上舉足以窺見前朝之文書程例，想亦杜

衡君所願舉述也。……………」

訥菴先生：杜衡君極願讀者指誤或補充。來函辨奏事與軍機之別，及舉關文書程例，至佩明詳。除在本刊披露外，已將尊函轉致杜君矣。附答申感！

編者

### 錄古傲

·明傲·

富韓公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煽，千歧萬轍，必勝而已；迨其得志，則逢時亦於良善，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吾因思古今小人柄國之久者，如李林甫十九年，蔡京二十二年，秦檜二十六年，史彌遠二十四年，嚴嵩二十六年，而君子多不安其位，惟唐之房杜姚宋，明之三楊劉謝，爲稍久耳。故辨君子小人之分，則難進易退易進難退，二語盡矣。

節抄楊味雲史論

# 浙江實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營儲蓄信託國外匯兌

總行：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電話：一八〇五〇

分行：上海虹口 杭州 漢口

# 金城銀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辦理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兼營  
儲蓄信託業務

電話：（一二四〇〇）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上海南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本埠分行：南京西路 林森中路 愚園路 八仙橋 虹口

提籃橋 徐家匯

外埠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雞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 團體分紅儲蓄

每戶十五萬元 分十戶萬元

（甲種）有六次獲得紅利  
**壹萬萬元**  
及四十八個一仟萬元之機會

！多會機 ！能利紅 ！短限期  
儲蓄致富·勿失良機  
各大代理銀行均可存儲

中央信託局

地址：上海天津路二號 電話：二七四九